

钱伟长：让美国人目瞪口呆的那声“No”

钱伟长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之后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他与同行的留学生于1940年9月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也是在这个9月，他的儿子钱元凯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多伦多完成学业之后，钱伟长应“世界力学之父”冯·卡门之邀，于1942年辗转来到美国，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成为同门。

出国后的钱伟长一方面日夜思念着祖国、妻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儿子，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此刻还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所需的技术，如果就这样回去，那才是辜负祖国的期望。

一天，钱伟长的老师周培源先生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钱伟长非常高兴，组织中国留学生在周末聚会欢迎周培源。饭后聊天时，周培源无意间问在座的人们有没有回国的打算，其中一个人说：“这要看中国的情况。什么时候中国发展到美国这样了，我才准备回国。”

周培源对这个回答很气愤，指责他是在逃避困难和责任，作为一个有骨气

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应该想着回去把国家建设好，而不是等国家建设好的时候才回去。这一番话深深地触动钱伟长，再次戳中了他的心结。

从那天起，钱伟长更加努力地跟随冯·卡门搞研究，主攻火箭和导弹技术。从1943到1946年，在冯·卡门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期间，是钱伟长科研的井喷期。每完成一个项目，就距离回国的路迈进了一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同年冬天，钱伟长立马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请求，但冯·卡门却总是找理由搪塞。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一直都在暗中关注着各国留学生，他们向冯·卡门透露过，要看管好自己的中国学生，必要的时候将介入干涉。

后来，钱伟长只好把回国工作的理由改成回国探亲，最终得到了回国的机会。冯·卡门在临行前一再叮嘱，让他回国看望亲人后，务必早日归来。

经过20多天的航行，钱伟长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也见到了已6岁却从

未谋面的儿子。

然而，国家并没有给钱伟长在科技研究方面大展拳脚的机会。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战时期，大部分的人民甚至连温饱都是问题。

钱伟长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成为机械系教授，月薪为14万元法币。而在当时，这些钱连两个暖水壶都买不到。为此，他只好四处兼职，挣钱补贴家用。就在这时，他的大女儿出生了。这让原本就窘迫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最困难的时候，钱伟长只能借钱度日。

1948年，钱学森回国探亲，转告他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邀请他回去复职，并且可以举家迁美定居。钱伟长考虑在美国不仅能解决生活问题，还可以给自己的一双儿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于是，他决定先去美国，解决掉眼前的问题，等日后找机会再回来。

但是到了美国领事馆，因为一个小的问题，事情又发生了逆转。

钱伟长在领事馆办理申请手续时，使馆的工作人员照例问他：“如果中国与



美国发生战争，你会忠于美国吗？”以往问这个问题，人们都会说“Yes”，他万万没想到，面前这个清瘦的中国人竟然不卑不亢地回答：“No！”钱伟长的回答让美国人目瞪口呆，但签证当然也遭到了美国领事馆的拒绝。

其实，他大可以嘴上说Yes，心里说No。但在钱伟长看来，对于爱国这件事是不能有任何妥协的，正如提到爱国这个问题时他常说的，“我们要有一种忠诚的精神！”

搜狐科技

1934年秋，24岁的曹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经老同学介绍，应聘到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英文系、国文系担任教师。

此后，在巴金等人的鼓励下，曹禺开始创作话剧《日出》。为丰富人物形象，他深入体验生活，积极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底层贫困人民交朋友。

曹禺为创作“交朋友”

一次，他冒着刺骨的寒风，半夜到贫民区，等候两个吸毒的乞丐，听他们唱“数来宝”。但由于他在预约时付的赏钱多了一些，引起了乞丐的怀疑，以为他是警察局的侦缉人员，没敢按照时间赴约。这可把曹禺急坏了，他赶紧去“鸡毛店”寻找那两位乞丐。

所谓鸡毛店并不是旅店，而是特别贫困人员用鸡毛、稻草铺在地上当床睡的破旧空屋。刚到鸡毛店，不料遇上一个醉鬼，故意找茬，曹禺的脸被重重地打了一拳。尽管受了一肚子气，但曹禺仍不死心。为便于和这两个乞丐交朋友，他脱下了干净的长袍大褂，换上了一身又脏又臭的衣服，再次到了鸡毛店，终于找到了他们，了解到真实情况。

后来，经人介绍，曹禺又到一个贩毒的“土药店”，和这个店里一个外号叫黑三的人真诚地谈心，并交上了“朋友”，从而较深刻地认识到黑社会的内幕。

为塑造翠喜这一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曹禺曾扮作唱数来宝的艺人混入妓院体验生活。第一次因为学得不像，一眼就被人看穿了，结果挨了打，一只眼睛险些失明。成功“混”入妓院后，有的妓女把曹禺当做和她们一样的苦命人，经常背着老鸨向他倾吐非人的悲惨生活，抒发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对新生活的向往。通过谈话，曹禺加深了对妓女的认识，对她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这些，在《日出》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人民政协网 2017.8.24 文/姜炳炎



1939年，崔琦出生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范庄村，他从小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成长起来。读完小学后，乡里还未建立中学，只好暂时辍学回家。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和大姐一块到妇女学习班上担任老师，受到大家的欢迎。他还曾因为“量地”被村里人为难和夸赞。

村里人知道他能写会算，有时派他去跟着分地。村里的地有些是三角形、菱形，甚至不规则图形。计算这样的地块面积要费些时间，村里人计算很久才

崔琦：农家飞出来的“诺贝尔奖”

能算出，可崔琦能极快的算出来，这让村里人感到新鲜又好奇。于是村里人故意找些不好算的地块难为他，每次崔琦都能非常准确的快速计算出结果。当时，乡里有个有名的老会计听说后，有些不服气特意找了块“一杆旗”（极不规则的地块）的地让他算。等到各边数据测量出来，崔琦一口就答出结果来，经过测量计算，崔琦果然答对了。当有人问他如何算出来时，他只是微笑不答。这件传奇小事初现了崔琦儿时的聪明。

1951年，崔琦在亲戚家人的帮助下，到香港培正中学读书。1958年，他获得美国资助进入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崔琦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有次上实验课，导师让崔琦去取螺丝刀。崔琦却发起了呆，因为他既不知道螺丝刀的型号，也不知道该如何动手做实验。这件小事极大刺激了崔琦，从

中国来的科研学者居然不会使用这么简单的螺丝刀。崔琦明显的感到到与西方人之间的差距，这促使他只能更加卖力地专注于个人的学业。

除了勤奋外，崔琦还有异于他人的实验方法。别人做实验总是为了求得预期结果，这样做起来相对容易。崔琦不把预期结果看得那么重要，而是更留心观察实验过程中一些意外现象。正确方法和辛勤汗水为他日后的科学发现奠定了基础。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表彰崔琦与另两位科学家因发现强磁场中共同相互作用的电子能形成具有分数分子电荷的新型“粒子”，授予他们三人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成为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世界上第六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蝌蚪五线谱网

冯玉祥妙解“孙子兵”

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不但自己生活俭朴，对手下的士兵也要求严格，官兵们都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性，吃、穿、用都非常节省。可是，官兵们的节俭却引来同在一个驻地的其他部队官兵的嘲笑。看着冯玉祥部队所有官兵穿得破旧，伙食简单，就开始挖苦讽刺他们，说他们是小抠，像要饭的，一点也没有当兵那种大爷样子，像孙子兵。

官兵们听到这些嘲讽的话非常生

气，就想找那些说风凉话的人算账，狠狠打一架，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冯玉祥听说后立即集合所有官兵开会，进行一番教导和规劝。

冯玉祥说：“我听说有人叫我们孙子兵，大家为此很生气，可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气的。如果好好分析的话，我们真就是孙子兵。首先从历史这方面说，他们的旅长曾是我的长官，而你们又是我的手下和学生，所以算起来你们比他们矮两

辈，不正是孙子吗？他们说咱们穿破烂布衣，而他们穿缎绸衣料，从面料上论，缎子是绸子的老子，绸子是布的老子，布就是缎子的孙子。这样一论，我们还是孙子兵。当然，话这样说不好听，我们真正要讲的不是称呼和吃穿，而是在战场上的能力和实力，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看出来谁是孙子谁是爷，大家如果想摘掉孙子兵这顶帽子，就让我们在战场上一见高低！”

“我们当然是战场的爷，绝对不是战场的孙子！”官兵们听到冯将军的训话，信心大振，不再有怨气，而是心悦诚服接受了冯玉祥的教导。

《文史博览》2017年第7期

陶行知：做诗人不能装样子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并亲任校长。作为诗人，陶行知还创办了一份诗报，并组织一些爱好诗歌创作的学生成立了“榴火诗社”，他自己还专门为诗社题了词。

每到有空时，陶行知就会组织学生去一些公众场合举办朗诵会。几次活动下来，这些文学青年开始有点飘飘然了。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诗人，有的留起了长发，有的特意穿起了破衣服，有的年纪轻轻就开始蓄起了胡子。

看到学生们这副样子，陶行知惊讶地问：“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个个都打扮得不伦不类、不人不鬼？”学生们笑

着说：“陶先生，这就是诗人的派头呀，诗人就是要特立独行、不修边幅。你看我们留胡子、留长发，这就叫为艺术而养精蓄锐呀！”

“养精蓄锐？依我看，这分明叫装模作样。”陶行知哈哈一笑后，语重心长地说，“有的著名诗人确实不修边幅，但他们不是装的，而是过分投入于诗歌中，忘记了生活的存在，那是一种艺术和心灵的境界。但是在没达到那个境界之前，你们还只是普通人，还只是诗歌的爱好者，你们不能忘记生活。你们只是想装样子来装饰形象、点缀生活，这绝不是诗人应该有的态度和样子。”



说完，陶行知揪了一把身边一个男学生的长头发，说：“这是艺术的长发吗？不，这是茅草山，我要是往上面点一根火柴就是‘放火烧山’了。”

从此以后，学生们都干干净净的，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知识窗》2017年第8期 文/陈亦权